

财务与会计专题研究

引文格式: 林钟高. 内部控制风险免疫的逻辑机理——基于生态学视角的分析框架 [J]. 常州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0, 21 (1): 51-67.

内部控制风险免疫的逻辑机理 ——基于生态学视角的分析框架

林钟高

摘 要: 在反思现实问题和简要回顾内部控制研究文献的基础上, 借助生态学的基本原理, 将内部控制定位为一个具有免疫识别、防御、监视和自稳、记忆等生态功能的风险免疫系统, 从生态理论视角深入分析内部控制风险免疫系统的逻辑机理, 初步给出了企业内部控制系统重构的框架, 试图提升内部控制的风险免疫品质。

关键词: 内部控制; 生态学理论; 风险免疫系统; 逻辑机理

作者简介: 林钟高, 安徽工业大学商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基于缺陷修复视角的企业内部控制风险免疫能力强化机制研究”(7157200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内部控制对关系专用性投资价值创造的传导机制研究”(71272220)。

中图分类号: F230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3969/j.issn.2095-042X.2020.01.006

一、问题提出

根据委托代理理论, 所有权与控制权的不一致产生了代理问题^[1]。为了解决代理人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 需要建立一套制衡、约束、激励机制来规范代理人的行为, 促使代理人为实现委托人的目标而努力^[2]。内部控制作为一种重要的制衡、约束、激励代理人行为的制度安排, 在企业管治中的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 作为会计信息质量的重要保证机制, 确保为信息使用者提供的信息真实可靠^[3-4]; 第二, 作为企业内部的管理控制机制, 促进企业提高经营效率和效益^[5-6]; 第三, 作为一种监督机制, 促使企业遵纪守法、防治舞弊^[7-8]。近年来, 内部控制研究及其准则的制定路径已经或者正在从审计视角(授权管控导向)向管理视角(风险管控导向)、从财务报告导向到价值创造导向调整或转型, 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有三项研究文献: 第一项是加拿大 CICA 所属的内部控制标准委员会 (CoCo) 1995 年发布的《控制指南》。该指南将内部控制看作是组织(包括资源、系统、程序、文化、结构、任务)的一部分, 所有这些组成部分结合在一起, 确保组织目标的实现。第二项是美国学者鲁特的《超越 COSO——强化公司治理的内部控制》一书。鲁特超越 COSO 框架范围提出内部控制是公司治理的一项主要职能, 重新构造了一个由管理方法和要素(包括基础性要素和方法论要素)组成的内部控制框架, 在这些要素中, 股东价值成为地位最高的要素。第三项是 2013 年发布(2017 年正式实施)的 COSO 新框

架。新框架在继承内部控制基本概念和核心内容的基础上提出了内控体系建设的17条原则、82个要素和工具,突出体现了原则导向,使内控体系的评价更加有据可循,为企业的内控建设提供了一套路线图和打分表。同时新框架强调董事会、经理层、内审人员在内控实施、有效性评价与认定等方面具有的“判断力”,新框架强调内控五要素应被视为一个相互影响的整体,进一步澄清了确保内控体系有效性的控制措施。我国内部控制建设虽然起步较晚,但是成效非常显著:2006年上交所和深交所出台《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五部委2008年5月联合发布《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2010年联合发布《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指引》《企业内部控制审计指引》;2012—2014年国资委、财政部连续出台有关央企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的一系列规定。这些制度标志着我国自2012年起进入内部控制的强制性监管时代,凸显了中文版“SOX法案”的特色。然而,现实资本市场中存在的系列现实问题令人无所适从。

第一,财务造假频发。在美国,丑闻和随后的立法促进了内部控制的发展,但严厉且实施代价不低的SOX并没有阻止2007年的美国金融危机,也没有阻止2011年在美上市的中国概念股大面积财务造假事件的发生。在中国,2003—2015年就有195家涉及财务舞弊的公司被公开行政处罚并禁入市场;2007年1月至2018年6月的87个财务造假案例中,57个案例涉及收入造假(会计造假和业务造假),占比66%;自2009年以来,中国上市公司法律风险指数(诉讼次数、涉案资产、非标报告和违规次数、高管责任等)逐年跃升,2019年开设的科创板市场出现了由于造假而被终止申请的案例。这些案件都造成了非常恶劣的社会影响,让我们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何在制度不断健全、监管不断强化的情况下,财务(会计)造假等恶性事件依然发生甚至不断恶化呢?

第二,持续经营受阻。中国证监会会计部2010—2017年发布的《上市公司执行会计准则监管报告》显示,因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疑虑而被出具财务报告非标审计意见的上市公司占全部上市公司的比例接近50%,这表明部分上市公司仍存在较高的持续经营风险。其他非标意见主要关注了上市公司的重大不确定性事项、重大资产负债认定、内部控制的有效性等风险。北京师范大学公司治理与企业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上市公司财务治理指数报告》指出,大多数上市公司财务治理指数没有达到及格水平,公司治理状况令人担忧。现实中不少企业过度关注利润和企业绩效,忽略了对随之而来的风险的管控,致使预定的经营和战略发展目标无法实现,甚至陷入破产的境地,投资者因此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第三,企业寿命短暂。国家工商总局2015年8月发布的《2000年以来全国内资企业生存时间分析报告》显示,中国中小企业的平均寿命为2.5年,集团企业的平均寿命为7~8年,中小企业的平均寿命远远低于美日等国家。众多企业“英年早逝”,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基业长青,这固然与外部环境恶化有关,但与企业契约精神与风险意识缺失、企业制度缺失与对制度缺少敬畏更是有天然的关系。不少企业风险管控体系不健全,内部控制制度执行不到位,缺乏“安全网”和“防火墙”^[9]。

基于这些现实问题,我们需要反思的是:内部控制作为一项风险管控制度,究竟是企业应对“监管需求”的外部压力所致,还是“自我净化”和“自我约束”的内部自觉行动?内部控制与企业业务是“离线关系”还是“嵌入关系”?内部控制究竟是认识问题还是执行问题?导致执行效果不佳的原因究竟是内部控制设计和执行的缺陷还是内部控制运行的内外部环境不匹配?对此,不同知识背景的学者围绕内部控制的有效性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这些文献提供了多元审视内部控制问题的视角^[10]。随着研究视角的进一步拓展,学者们将自组织理论、免疫学原理引入内部控制研究领域,认为内部控制可以作为企业防范风险的“免疫系统”^[11],并运用“生物免疫系统”等相关理论,提出“将企业内部控制打造成为企业持续平稳发展和有效控制风险服务的

人造免疫系统，科学健全的内部控制机制对于防范内外部风险、维护自身机体健康起着独特作用”等主张^[12]。需求决定生产，我们理解的内部控制免疫功能主要是指内部控制在感知风险信号时，主动地发挥自身的免疫功能，预测、控制、消除潜在的风险，以减少企业经营运行中面临的风险，为企业架设免疫安全网。因此，从生态学的角度将内部控制定位为一个“免疫系统”，既符合内部控制的原始禀赋，回归内部控制本质与功能的初心，又符合人们对内部控制的心理预期，有助于解决或解释中国企业现实实践中的内部控制问题，丰富和发展内部控制理论和方法。“由技入道”，本文通过联系市场现象和现实环境，总结和探索内部控制制度以防范和降低企业风险的实践规律和作用机理，为增强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建设的主观能动性，检验强制推行内部控制的实施效果等重要问题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理论视角与政策优化思路。

二、内部控制有效性及其经济后果：文献回顾

在理论研究上，内部控制的学术研究主要涉及三个方面：外部审计、组织理论、经济学^[13]。从外部审计的角度来看，内部控制是审计研究的重要领域，重点讨论的是会计控制如何影响财务报告的可靠性。从组织理论的角度来看，内部控制不再局限于审计领域，研究涉及行为控制、结果控制、人员控制。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内部控制研究的主要根据是代理理论，涉及控制机制、约束机制、激励制度。相对于丰富的规范研究，内部控制的实证研究近十年来才刚刚兴起，下面做一个简要的回顾^①：

其一，内部控制的投资决策价值。Wills 等^[14]认为高质量的内部控制，有助于实施公司战略和选择企业政策，使现有的和潜在的股东确信公司行为处于有效的控制之中。Ashbaugh-skaife Hollis 等^[15]、Hermanson^[16]研究表明，相对于管理层报告和审计师报告而言，内部控制鉴证报告会影响财务报告利益相关者对会计信息可靠性的理解，能够为公司的长远稳定发展提供合理的预期，进而有助于股票“买卖-持有”或者债务“履约-展期”等决策行为与风险把控。Ali Fekrat 等^[5]、Newson 等^[17]研究认为，对外披露内部控制信息的作用链条是：诠释现在或潜在的竞争优势→展示核心能力和全球化竞争策略→评估主要风险趋势及其管控措施→布局全球投资决策。李育红^[18]研究认为，公司治理内部机制对内部控制有效性具有重要作用，股东具有监督管理层的动机和能力，薪酬机制能提升管理层的努力程度，而声誉机制则能够约束与惩罚经理层的偷懒或者投机行为。方红星等^[6]研究发现，内部控制与公司治理之间存在内部管理监控系统与制度环境的密切关系，公司治理是内部控制的制度环境基础，而内部控制是公司治理的核心机制，因此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对抑制企业非效率投资的作用存在明显的效应差异：因为公司治理具有高度的权力制衡与约束机制功能，所以在抑制意愿性非效率投资方面的作用明显；因为内部控制具有明确的职责分工和业务流程牵制作用，所以在抑制操作性非效率投资方面的作用效应明显。张会丽等^[19]研究表明，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够有效抑制企业过度使用和随意滥用自由现金流，保证现金流的安全。陈汉文等^[20]研究发现，高质量的企业内部控制制度有助于降低银行融资成本，而且这种作用对国有控股企业、金融发达地区的企业、产品市场竞争激烈的行业更加明显，这充分证明内部控制质量对产权属性、市场化进程、竞争状态具有非常明显的强化作用，两者之间表现出明显的同步驱动特征，这进一步证明了内部控制作用的发挥，必须依赖制度环境的优化

①限于篇幅，本文对内部控制缺陷的原因、经济后果以及治理方面的主要文献，存而不论。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见林钟高：《内部控制风险免疫机理与效应研究——基于制度缺陷及其修复视角的实证检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7。

与完善。

其二,内部控制信息的市场价值。Palmrose等^[21]研究发现,对于不同原因引起的财务重述,其市场反应是有差异的:如果财务重述是由SEC(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导致的,则在宣告日当天及第二天平均负超额收益率为-4%,如果财务重述是由公司内部和外部审计师导致的,则两天的平均负超额收益率分别达到-18%和-13%。尽管如此,不管导致的原因有多么的不同,形成负超额收益率的内在原因都是企业内部控制系统存在缺陷。投资者和潜在的财务报告使用者都将内部控制的缺陷视为“利坏”信号,潜在投资者对公司未来现金流预期会降低。史蒂文·J.鲁特认为内部控制报告有利于增加企业价值,公正透明的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与股价正相关^[22],而内部控制缺陷信息(比如严谨性差、自我评价存在缺陷、审计鉴证结论出具非标意见、信息披露不准确等)的披露与股票价格负相关^[23]。杨德明等^[24]研究发现,内部控制质量与银行贷款具有正向关联,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对国有企业获得数量更多、期限更长、成本更优惠的长期贷款极为有利。由于产权属性差异和银行贷款行为的“所有制”歧视,民营企业这方面的表现不明显。郑小荣^[25]、杨清香等^[26]等研究认为,内控信息的公正披露与有效监管,有助于提升企业防范舞弊的能力和提高了企业运营效率,但是市场反应会因为披露的不同情形而产生差异。从内控质量来看,内控有效引起股价上涨,内控缺陷则引起股价下跌;从披露动机来看,强制性披露较自愿性披露更具有价值相关性;从披露内容来看,详细披露会引起股价上涨而简单披露则不一定会引起股价上涨;从披露管制来看,强制性披露和自愿性披露交互影响的市场反应,比单纯的强制性披露或者自愿性披露的市场反应更显著,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和组合状态的重要市场价值。赵息等^[8]研究发现,企业并购绩效受内部控制与高管权力的联合影响,内部控制与并购绩效正相关,高管权力与并购绩效负相关。从内部控制与高管权力之间的共生互动关系(从极端意义上说,内部控制内生于对企业高管权力的制衡)角度来看,如果高管权力超越内部控制的制约,并购只会让高管实现个人利益而不会给股东带来财富,企业也无法实现预期的并购价值,可见,内部控制是针对高管滥用权力而设计的一套制衡机制,对实现并购绩效具有重要作用。

其三,内部控制与会计信息(盈余)质量。国外学者围绕《萨班斯法案》(SOX法案)进行了大量的研究,Chan等^[27]、Gao等^[28]研究发现,《萨班斯法案》中的内部控制条款(特别是404条款)抑制了上市公司披露高质量财务报告的动机。出于对404条款的择机披露的考虑,那些存在内部控制实质性缺陷的公司会有意披露更多的坏消息、报告更低的盈余质量,存在名目更多和程度更高的盈余管理行为,投资回报也更低。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公司经营的复杂程度——经营越复杂,则实质性缺陷越多,但公司实质性缺陷与公司规模及盈利能力没有直接关系^[29]。Doyle等^[3]通过调查内部控制与盈余质量之间的关系研究认为,内部控制的实质性缺陷与没有实现现金流的盈余估计有关,内部控制是盈余质量的一个驱动因素。我国学者却得出了迥然不同的结论。张国清^[4]研究发现,由于公司内部特征和治理因素对内部控制和盈余质量存在系统性的影响,因此内部控制质量与盈余质量之间并不存在同步变化的规律。也就是说,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并未伴随高质量的盈余,改善内部控制质量并没有提升盈余质量。方春生等^[30]、张龙平等^[31]、董望等^[32]、方红星等^[6]、范经华等^[33]的研究均表明,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够抑制公司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高质量的内部控制降低了企业盈余管理程度,提高了应计质量;内部控制鉴证提高了会计盈余质量,提高了投资者的盈余反应系数,显著提高了财务报告的可靠性,实现了提高财务信息质量的控制目标。进一步研究发现,如果把执行内部控制鉴证的审计师行业专长联合考虑进来,则内部控制与审计师行业专长存在互补关系,即内部控制质量越高,审计师行业专长对应计和真实盈余管理的治理作用就越明显。刘行健等^[34]通过检验内部控制缺陷的配对样本研究发现,公允价值是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重要会计政策选择,且内部控制缺陷对公

允价值和盈余管理的关系产生影响。具体表现为：对存在内控缺陷的上市公司而言，只有营业外收入与盈余管理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而对不存在内控缺陷的上市公司而言，投资收益、资产减值损失与盈余管理都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如果说，SOX 法案颁布之前正面视角的研究是主流的话，那么，之后的文献则更关注内部控制缺陷这一负面视角的研究。SOX 法案 302 和 404 条款要求企业披露其内控存在的缺陷，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内部控制实证研究中内部控制质量的量化问题。对于目前的研究文献，笔者的看法是：

内部控制应风险而生，其制度构架、运行保障、效果评价应该围绕风险免疫能力的角度展开，目前国内外学者对此有了一些研究。基于美国的资本市场，更多的研究是以内控缺陷如何影响财务报告质量（信息风险的一种）为桥梁，讨论内控存在缺陷的公司是否存在更高系统性风险和非系统性风险，以及这种风险如何影响权益资本成本。国内的研究现状基本类似，已有的研究更多地关注内部控制质量如何影响企业盈余质量以及财务困境（分别是信息风险和财务风险中的一种衡量标准）。尽管如此，研究者在许多重要问题上没有形成一致意见，较少关注新兴资本市场中的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影响因素及其经济后果等问题，也很少涉及内控质量影响企业风险的影响机理。问题的根源在于没有分析与挖掘内部控制风险的本源，没有分析与解构风险免疫机理、风险免疫过程、风险免疫效果等，未能实现内部控制与风险管控的逻辑关联。而生态学理论原理可以更好地建立这样的关联。生态学涉及的内容广泛，强调企业与合作的互惠共生、互动连锁、共同进化等理念。因此，借鉴生态学理论原理，把企业当作一个复杂的自适应系统，建立企业生态机理及其生态战略与内部控制制度体系的逻辑框架，从内部控制有效性的视角诠释内部控制的“风险免疫机理”，强化内部控制的风险免疫能力，既解决了由于经济全球化发展进程加快、生存环境不确定所导致的传统企业战略无力解决的企业所面临的易变性（Volatility）、不确定性（Uncertainty）、环境复杂性（Complexity）、模糊性（Ambiguity）等问题，又可以持续改进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解决企业恶性竞争、违背商业道德、只顾眼前利益等负面问题。因此，如何构建生态学范式下的内部控制体系，建立反馈和自适应机制，建立信任与互惠机制等问题，摆在了我们的面前。

同时，内部控制作为利益相关者维护交易关系、降低交易成本的制度装置，有助于维护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但是在以往的研究中，对于内部控制风险防控功能的方式和途径，还缺少过硬的理论机理分析与实证经验证据，有待进一步分析和检验。基于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特别是美国）资本市场的实证研究，主要关注执行 SOX 法案 302、404 条款的成本收益，分析和检验内部控制缺陷对投资者利益的影响。目前内部控制受投资者需求的影响这个结论基本确定，但关于内部控制制度是否真正保护了投资者的相关利益尚没有统一结论。在国内，规范研究普遍认为，有效的内部控制会对投资者利益保护产生积极的作用，但涉及内部控制如何保护投资者的作用机理的相关研究还不够深入，这导致进一步规范和完善企业内部控制体系的相关制度无法“落地”。虽然近年来关于内部控制的投资者保护功能的实证研究已得到了重视，但已有的文献要么单独从外部投资者风险感知视角来研究内部控制对企业风险的影响，要么单独从审计师风险感知视角研究内部控制对审计意见、审计收费的影响以反推内部控制对企业风险的影响。直接分析和检验内部控制制度免疫系统对企业风险的作用机理的文献还不多见，有说服力的经验证据还未出现，相关领域的研究理论架构与经验证据仍需进一步完善。中国作为一个新兴转型经济体，存在投资者法律保护不健全、公司治理有缺陷、资本市场发展不完善等问题，企业风险更难以通过企业价值或绩效进行判断。因此，揭示内部控制的风险免疫机理，研究内部控制如何影响企业风险，可能更为关键。

三、企业内部控制系统的生态学基因审视

制度分析分成整体和个人两个流派,整体流派忽视个人作用,难以量化,说不清制度变迁的源泉;而个人流派忽视市场作用,缺少集体行动,存在循环论证的缺陷^[35]。内部控制作为一种平衡利益相关者的契约装置,可以从生态学角度兼容集体和个人,强调内部控制与环境间的共生互动关系。

首先,两者在不断调整进化中相互适应。企业是一个契约集合体,内部控制作为这个契约集合体内的一种基于信任的制度安排,与环境相互影响,互动优化。内部控制的不断完善需要良好的制度环境,能使企业内部的激励约束机制更有成效。相反,公司内部环境机制的持续优化,能促使内部控制外部化,促进内部控制供需趋向均衡。根据危机管理理论所倡导的预防思想,内部控制的发展变迁,既是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的需要,也是解决各种控制活动和措施滞后问题的需要,充分体现了内部控制与环境互动的思想。

其次,用生态学原理揭示制度变迁,本质上处理的是制度与环境的关联问题,体现内部控制制度建构与演进的统一。内部控制既是博弈的条件,又是博弈的结果。将这两者结合起来,再由内部控制对经济环境发展和变化进行持续回应与不断改进,就形成了内部控制的演进。这个演进是两个环节的统一。一个环节是内部控制的建构或设计:当环境经济发展带来潜在利益时,人们理性地建构对自己或自己所在的集团更为有利的内部控制制度。不同的职能部门和岗位配置,都会有相应的建构或设计。但是只有符合企业整体发展、促使目标达成的那个或那些建构与设计才会在博弈中得到实在的支付,并得以实现,这个环节可以通过个体分析的方法体现。另一个环节是内部控制的演进:在博弈时,任何参与者都无法不在已有的内部控制环境中进行活动。内部控制建构与设计都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只能在充分尊重企业文化传统和对其不断创新的基础上进行建构与设计,制度演进才具有文化继承性。任何个人或者利益集团(职能岗位),在内部控制建构、设计、演进时都必然受到个人或利益集团(职能岗位)的生态环境或者文化传统的制约。因此,这个环节又只能通过整体分析的方法来体现。

最后,生态学研究范式对内控制度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历史上任何阶段的内部控制规范,都是当时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及其选择的结果。社会经济环境发展水平及其控制基础决定着内部控制思想形态及其规范的形成,企业的任何经济活动(投资、筹资和经营)都离不开内部控制规范。企业追求效用最大化(或者财富最大化、价值最大化等等)是在一定的制约条件下进行的,这些制约条件就是“制定”“发明”“创造”“演进”等一系列控制规则、规范、流程。如果没有内部控制的约束,那么每个职能岗位(或企业整体)追求效用(或财富)最大化的结果,只能是企业乃至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的混乱或者低效率。可见,生态学基本原理可以顺利迁移到内部控制制度分析当中来,成为内部控制指导性法则。这些原理包括稳定性原理、多样性原理、耐受性原理等。

(一) 稳定性原理

生态系统具有保持原稳态的能力。这种能力表现为:在受到外界干扰的情况下,系统具有抗干扰性、还原性、耐久性、系统特征的动态性。稳定性原理体现了生态系统的动态稳定性实现机理^①,对企业的经济活动、内部控制生态系统的恢复和重建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内部控制在

^① 涨落指内部控制系统在内部因子和外部因子的影响下偏离某一稳定的波动,而生态序是内部控制系统和过程有规则的排列方式,生态序越高,则越能抵抗涨落,内部控制系统也就越稳定。

本质上是对确定性的规范和对不确定性的预警。企业经济环境中的不确定性包括人与自然之间的资源配置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利益调整关系，前者主要解决的是技术（流程）问题，而后者主要解决的是基本经济交易关系中的规则、体系、习惯、文化等问题，使交易双方对彼此的行为有一个合理可靠的预期，降低不确定性，保证经济管理和财务决策行为能够在较为确定性的环境中运行。稳定性原理应用到内部控制制度分析的生态学意义为：经济交易者应尽量减少在“自然状态”中妨碍交易活动的不确定性成本支出，建立各种确定性的标准规则。这些准则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维度：

1. 交易成本维度

交易成本是人们协调矛盾和平衡利益所支付的成本，“交易成本最低”成为制定和执行一项制度的基本原则，内部控制制度自然也不例外。内部控制作为企业各职能部门控制活动“一致认同”的结果，是必须执行的一种行为规范，具有适用范围广、边际实施成本较低、规模经济的制度效应。依照《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的要求，规范和保证企业经营管理合法合规、资产安全、财务报告及相关信息真实完整、经营效率提高、企业发展战略实现，既是企业内部控制的目标诉求，又是减少环境不确定性、抑制机会主义行为的“企业宪章”。内部控制使得企业不同的岗位或职能部门，对企业发展和战略目标形成一个合理可靠的预期，为企业运行权力制衡与科学决策提供一个保障框架。内部控制规范通过节约交易费用，增进企业福利，促使企业运行乃至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更加有效^[36]。

2. 稳定预期维度

内部控制是委托代理关系人多方博弈的结果，是多方力量均衡的体现^①。随着金融证券市场的发展，信息提供者与使用者的分离程度越来越高，界限也越来越模糊，投资者（或委托人）对证券市场的信息需求也表现出多元化和复杂化，投资者（或委托人）的利益保护成为证券市场的核心诉求。一方面，不同企业内部控制在基本上具有相同的框架与普适性，但是由于各企业具有不同的资源禀赋（资源异质性）和管理文化（管理异质性），内部控制在具体或者核心环节具有不完全透明性，信息使用者与提供者之间必然存在冲突与对抗。另一方面，高质量内部控制约束下生成的会计信息，具有客观性与可靠性。通过内部控制审计鉴证、公开披露内部控制规范下生成的会计信息以避免管理当局拥有超级信息的特权，有助于降低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概率。于是，企业通过博弈以求各方利益的均衡是最好的解决办法，而内部控制制度的产生正是企业内部各方博弈的结果。博弈者会依据对手的行为方式以及可能采取的战略行动作出自己的决策，因此，博弈最终达到“纳什均衡”状态时所产生的内部控制规范，则事实上成为企业内部各职能部门普遍接受的规章制度。博弈可有效预防机会主义，减少信息不对称现象，稳定各方预期，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利益均衡。从整个社会来看，内部控制作为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风险免疫机制，通过博弈促进各方进行信息交流，不仅有利于提高企业间博弈者的利益，而且有利于提高社会整体福利水平，改进帕累托效率^[37]。

①一方要隐匿信息，另一方要不断搜集信息，如何满足双方的要求呢？在内部控制规范用户的博弈中，一个折衷办法便是制定规章制度，要求内部控制规范公开透明。这是博弈的一个“均衡点”，在这个点非合作博弈向合作博弈发展。之所以会达到这一“均衡点”，是因为博弈中的局中人产生竞争，譬如两个人分蛋糕，每个局中人都希望自己的那块可以分得大一些。然而，竞争仅仅是博弈中相互依存的一个方面，应该指出，通常的博弈并非纯粹总是局中人之间的竞争，相互依存的另一个方面是局中人可以有某些共同的利益。作为局中人策略行动的结果，蛋糕可以增加或者减少，局中人的共同兴趣有时在于增加蛋糕的总量，他们互相“倾轧”之处在于如何分配。从博弈论研究的角度，做大蛋糕是博弈的第一步，而分配蛋糕则是博弈的第二步。

3. 外部性内部化维度

福利经济学认为,外部性的存在影响市场的有效性,人们会通过搭便车行为获得收益,或者让他人遭受损失。就国家法规和企业章程而言,内部控制作为企业自我约束和管制的政策选择,是企业内部制度建设“剩余控制权”的一种表现。按照经济学的解释,与“剩余控制权”相对应的是“剩余收益权”,内部控制作为一种平衡利益集团的制度装置,与众多其他制度一样具有不完全合约的特征,必然有“制度剩余收益”存在。把“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结合在一起,可以让决策者承担决策的全部财务后果。这样,决策者的自利动机就会驱使其尽可能地作出好的决策,而避免坏的决策。相反,“剩余控制权”和“剩余收益权”残缺不全或搭配不当,导致权利残缺,必然导致内部控制低效率和低效益,实践中存在的财务造假、会计虚假信息、企业失败等众多问题,便是其典型表现。只有赋予企业经营者内部控制政策的制定权与选择权,合理匹配“剩余控制权”与“剩余收益权”,才能确保实现内部控制目标。企业作为一个多层代理关系的契约网络,其内部必然存在着复杂、多层级的委托代理关系——股东大会—董事会—经理层—部门经理人员。允许企业及其内部不同岗位制定或者选用适用的内部控制政策,既可以缓和第一层次委托代理关系中的利益矛盾,又可以对企业管理层及其内部进行最佳的激励与控制,从而协调企业管理层内部各个利益主体的关系。总之,从管理当局剩余控制权与剩余收益权的匹配角度看,赋予管理当局一定程度的内部控制政策制定权和选择权,既是企业内部相关利益集团博弈均衡的结果,又是节约契约成本、激励和监督内部控制有效实施的重要措施。实践证明,如果能够良好地执行内部控制,那么外部性就能够内部化^[38]。

4. 激励约束维度

企业内部各利益集团,一旦选中了某种内部控制制度,其行为就会受到相应的约束。内部控制明确规定了各种行为的作用范围及相应的利益,同时明确了违规的后果及其代价。在内部控制制度的制订和选择中,经营者(也是内部控制制度执行者)同时被赋予了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的选择权和剩余规范的制订权,以激励经营者规范行使自己的权力。在制订剩余规范时,经营者间的博弈使得剩余规范能较为准确地反映经营状况及其风险,这是因为经营者更加清楚自身的经营处境与行业趋势,知道何处使用何种规则可以规范自身行为,以便更真实地反映企业风险,减少代理人“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行为,降低内部各利益集团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显然,内部控制的激励与约束作用缘于“缔约观”,即:内部控制规范下生成的会计信息(数据),是各种合约订立的基础,影响部分合约的缔结及其调整,并对所涉及的各方行为具有经济影响。正是受内部控制“缔约观”的影响,职能部门(岗位)会出现转换或者择机选择控制模式而导致寻租的现象,出现内部控制制度执行不到位的情况,这从反面证明了内部控制激励与约束作用的存在及其重要影响。根据信息经济学理论,激励相容约束一旦成立,理性个体和组织就会发现,遵守企业内部控制规范的程度越高,获得的收益也就越大^[39]。

(二) 多样性原理

内部控制规范的生态分析存在两个最基本的假设:其一,经济主体的行为以效用最大化为准则,即经济主体都期望自身利益(货币或非货币)最大化;其二,人类社会的经济资源是稀缺的(内部控制规范作为一种制度资源,也具有稀缺性)。在这两个假设条件下,竞争就伴随着职能部门利益博弈而发生,内部控制规范在竞争中的重要性逐渐显露出来。从生态学视角进行内部控制分析,为解决不同职能部门的互动问题提供了“群落交错”“边缘区间”等理念及其可行方向。如果会计信息是在没有规则的前提下生成,市场竞争就会无所依据,市场失灵就会发生,这就是著名的“租值消散”定律^[40]。因此,就租值消散而言,要减少竞争中的资源浪费(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恶性竞争),增加企业财富,促进企业成长,就必须采用较好的方式解决竞争中的冲突问

题，而内部控制就是有效约束管理者竞争行为的合约安排。必须指出的是，任何内部控制的合约安排都存在一定的局限，即便如此，这些内部控制的合约安排都是企业职能部门为了减少租值消散或降低交易费用而作的选择。因此，要了解企业职能部门在现实企业经济活动中的行为，就必须研究和了解内部控制的合约安排方式与实际运作流程。也就是说，在减少租值消散的意义上，内部控制合约安排在处理异质性个体问题上起到了重要作用。多样性原理应用于内部控制制度分析，体现了以下三个特性：

1. 制度的遗传性

诺斯把阿瑟提出的技术变迁机制扩展到制度变迁中，用“路径依赖”概念证明了制度变迁所具有的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了某一条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沿着既定的路径，企业经济活动及其制度变迁既有可能处于良性循环，也可能进入恶性循环，沿着错误的路径越陷越深，甚至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之中。内部控制制度变迁过程中“路径依赖”产生的原因有三个：第一，正式规则作用的连续性、累积性。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约束着各职能部门的自由度和行为特征，影响企业经营活动的效率和效果、资产安全性、经营信息和财务报告的可靠性，影响企业实现经营目标。第二，非正式规则作用的持久性和沉淀性。个体声誉或者交易主体间的文化背景等非正式制度，是维护契约、改变契约的重要原因。企业在其发展历程中形成的独有的关于内部控制活动的非正式规则、控制理念、文化的总和，主要是基于内部控制制度倡导下形成的并为全体员工共同认可、信奉、实践、传承的精神财富的集合，为充分发挥内部控制在企业活动中的职能和作用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非正式规则能够降低团体内部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促进成员间的相互信任，使成员的行为方式更加情境化^[41-42]。第三，内部控制作为“一把手”工程，与企业高管集团的认知与利益密切相关，这个特殊利益集团具有保持制度持续变迁的动力。尽管从现实和短期来看，“一把手”有违背制度的主观偏好，但是从制度的法律后果、利益趋向、硬约束功能（比如高质量的内部控制抑制公司各级人员的机会主义行为，降低风险，提高投融资效率，保护利益相关者利益等）来看^[43]，“一把手”与现有制度是共存共荣的，具有维护通过制度来解决问题的能力逻辑基础^[39]，在博弈矩阵中处于主导地位，不断提高维护或者持续改进原制度的自觉性，从而获得创新制度的预期收益。

2. 制度的排异性

将生物排异性概念引入内部控制制度系统之中，实际上是排斥可能进入本系统的其他要素特性，以维护制度系统自身的稳定性与纯洁性。内部控制制度的发展变革，随着管理环境和控制技术的发展而不断移植与创新。而制度的移植与创新是全景式的观察、反思、嵌合、创新，努力保持被移植制度与当前制度中环境形态的融洽程度^[44]，实现制度的“亲和性”^[45]。理论上我们可以将内部控制按其控制目的的不同分为会计控制和管理控制。其中，会计控制属于通用的公约性制度，具有高度抽象或者对象无差异性特征，迁移比较容易；而管理控制，尤其是那些涉及企业创新体制、决策体制等战略内容的管理控制，因为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制度排异性更强，迁移较为复杂。但是会计控制与管理控制并不是相互排斥、互不相容的，有些控制措施既可以用于会计控制，也可以用于管理控制。因此，内部控制指引特别指出，内部控制应当与企业经营规模、业务范围、竞争状况、风险水平等相适应，并随着情况的变化及时加以调整。内部控制移植的排异性值得引起足够的注意。中国要建立以风险管控为核心的内部控制机制，必须健全公、私履行机制等配套措施，必须找到法院在企业治理中的替代机构，否则终究会成为“挂在墙上、锁在抽屉、摆在书橱的法”，也会产生制度排异性。

3. 制度的扩张性^[46]

内部控制制度与生命个体的发育阶段类似，从建立到消亡或被替代，都经历一个扩大、稳

定、调整、衰退,直至消失的全过程。Leifer等^[47]将控制定义为一个预测过程,是一套将系统要素与期望目标或者状况相连接的,可以预测的标准。Green等^[48]将控制定义为一个控制调整的过程,指导和限制交易主体行为符合一定的标准或者达到一定的标准。制度的扩张性可以从内部控制的四个发展阶段得到诠释:一是内部控制牵制阶段(20世纪40年代前)。这一阶段的重点在于防范和解决企业成员之间因专用性投资而导致的投机风险,降低交易成本,侧重于契约控制、监督机制、资产专用性投入的互锁机制。二是内部控制及其控制结构阶段(20世纪40年代至90年代)。这一阶段重点关注合作关系中的交易成本和协作成本,侧重于关系契约、沟通价值、信息管理机制、整合的冲突解决方法等具体的企业控制方式。三是控制框架与风险整合阶段(20世纪90年代之后)。信息技术产业和高风险行业迅速发展,管理学思想不断创新,尤其是会计舞弊与企业盈余管理行为屡禁不止,使内部控制更应该与危机管理、风险管理深度融合,控制重点是企业在创造最大化合作价值过程中的风险。强调控制治理形态(控制方式)对合作方有效合作、共同创造价值的重要性,侧重信任视角的控制功能、关系契约、风险整合等价值创造机理和路径。四是全面风险管理阶段(2017年之后)。新的框架从企业使命、愿景、核心价值出发,关注主体价值创造和业绩提升,强调嵌入企业的管理业务活动和核心价值观。内部控制制度从原有“控制框架”下的风险管理视角转变为“管理框架”下的决策咨询风险顾问视角。这就是说,如果共享一个制度空间的职能主体理解和遵从这些制度所体现的规范思想和价值,信任便得以大幅度提升。从这个意义来说,制度的扩张性能够有效降低信任风险,提高行为者行动的可预测性。

(三) 耐受性原理

耐受性原理可以用来处理制度变迁的临界条件。依照制度变迁理论,内部控制制度变迁与其他制度一样,存在明显的“制度收益或者制度利润”。但是由于制度变迁的外部性、规模经济、风险和交易成本等的作用,这些“制度收益或者制度利润”难以在现有的制度结构安排中实现,因而,通过制度变革手段改变“制度收益或者制度利润”成为内部控制变迁的核心动力。因而在原有制度安排下,一些人为获取潜在的“制度利润或者收益”,就会努力克服制度障碍,变革旧制度,或者生成全新的制度,但是只有预期净收益大于预期成本时,才可能真正实现制度变迁。诺斯认为,制度变迁是从均衡到不均衡又回到均衡的进程,而这种制度均衡与不均衡状态,即由制度需求与制度供求所决定的。所谓制度的需求通常是指制度服务的接受者的需求或社会需求。制度供给是指制度制定者的供给,它是由制度制定者“生产”和提供的。当制度需求和供给一致、制度供给者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MR=MC$)时,制度的供给与需求相等,产生或者实现制度均衡。但是这种均衡状态只是暂时的、相对稳定的或者“点状”的,而制度非均衡状态则是常见的,制度非均衡必然导致制度变迁。在促进或推迟制度变迁中起着关键作用的是制度变迁成本与收益之比。因此,耐受性原理在内部控制变迁中的解释价值在于:

1. 冲突与斗争

冲突与斗争是企业规则体系进化的动力源泉^[49]。依照这个理解,内部控制体系是企业内部转型与权力制衡的主要产物。企业一部分职能主体试图改变控制规则体系,而另一部分主体则试图维持控制规则体系。这种冲突与斗争的结果是:一方面,将无法解决的矛盾诉诸内部控制的相关人员(会计人员、内审人员、风险师等),由他们进行职业判断,作出权衡;另一方面,运用新的或者相反的视角诠释旧的规则系统,或直接采纳创新的规则系统,而被诠释的旧的规则系统或者创新的规则系统均可能留下操纵空间。

2. 创新和变异

第一,内部控制规则与新问题或者新情境下的旧问题不匹配;第二,新技术发展与商业模式变革,如互联网技术引起控制环境的变化,AI技术引起控制活动和手段的变化;第三,创新型

学习组织和新旧规则的矛盾与冲突；第四，价值和企业文化的变迁与诠释和遵从内部控制规则系统的冲突；第五，环境和物理条件的变化，内部控制的变迁过程（内部控制牵制—内部控制控制—控制结构—控制框架—风险整合—全面风险管控）就是创新和变异的典型体现。发生上述变迁的重要原因是内部控制思想不能成功地应用于企业经济发展新情况之中，或者不能适应新环境。

上述分析说明，一方面，现代企业的构建和管理必须遵从大量的规则与程序，但是现实中人们往往只介入一些与其实际工作有联系的领域，无法把握大量由于规则扩散导致的未知领域；另一方面，现代企业的巨大分化能使特定规则体系系统地发展，但又在某种程度上妨碍或阻止总体规则的形成，两个方面共同导致了企业规则扩散与结构性不连贯问题。企业内部控制制度体系变得越来越“规范化”，具有“表面理性”。同时，企业的部分雇员和领导者缺乏对企业内部控制体系“总体秩序”和“总体理性”的认识。因此，生态学分析范式表现出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两种不同分析框架兼容的潜力，并在自身独特的研究体系下实现融合，这充分体现了生态学分析范式在内部控制体系重构中的适应性与重要性。

四、基于生态学视角的内部控制风险免疫系统逻辑机理的初步考察

生态学理论重构内部控制系统的路径也许是多样的，但如果将内部控制作为一个风险免疫系统，分析内部控制机理，重构制度体系，或许是一个可行的模式。在实践中，作为各种经济利益主体博弈的契约集合体，企业会遭受内外部“疾病”的侵害，这些“疾病”就是影响企业正常经济活动的各种风险。根据生态理论、生物免疫系统、组织免疫理论的界定，企业内部控制作为一套风险控制机制和“免疫系统”，能够对企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内外部风险做出及时的反应，以解除和减少企业风险的不利影响，保持企业相对稳定性，促进企业良性发展。

（一）内部控制是一个风险免疫系统

与生物有机体的免疫系统类似，企业内部控制发挥风险免疫功能作用的内在机理在于发现问题、处理问题、完善机制、增强免疫功能。理论上存在两种经典的免疫模式：第一种是自我-非我识别模式，该模式认为免疫系统对异己抗原产生的外源性信号产生应答^[50]；第二种是危险模式，该模式认为免疫系统只对损伤细胞产生的危险信号产生应答^[51]。在不同的免疫模式下，内部控制的风险控制方式存在较大差异，基于危险模式的免疫应答方式的内部控制风险免疫过程如图 1。

免疫指有机体系统识别“自己”与“非己”成分并排斥异己以维持机体内部稳定的生理性防御机制，清除“异己”成为生物免疫的关键。对企业而言，其“病毒”可以由外部（客观）感染，也可以由自身（主观）繁殖，且大多情况下，是内外部交织而成的。企业组织对“异己”的识别与应对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经营环境突变和不可预测性增加了组织免疫识别与应对“异己”的难度。组织免疫首先关注的是维护企业健康以

使企业基业长青，然后才是企业的创新发展和核心竞争力形成，因此，分析组织免疫作用机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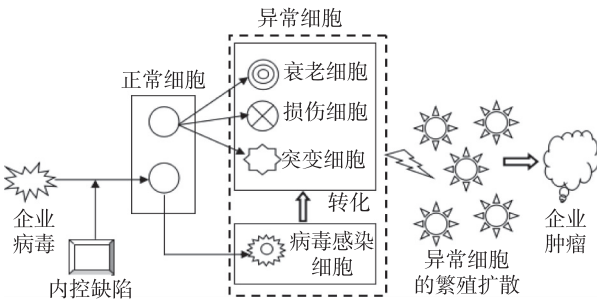


图 1 基于危险模式的免疫应答方式的
内部控制风险免疫过程

清除组织有害异己应该成为内部控制构建的核心。所谓有害异己,其本质是一种使企业遭受损失或面临损失威胁的风险或病毒。一方面是企业“细胞突变”问题。企业的正常细胞会转化成异常细胞,导致企业正常细胞感染病毒,并引起正常细胞的损伤、老化、突变。如果不能有效控制异常细胞,甚至任其在企业内部不断繁殖和扩散,最终会形成企业肿瘤,危及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甚至导致“企业失败”等灭顶之灾。另一方面是企业“基因重组”问题。异己的出现暴露了企业的弊端,企业必须“对症下药”,通过“清除障碍”为企业发展赢得更多、更有效的发展机遇,使“异己”成功地转化为“自己”。也就是说,尽管企业面临较高程度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见性,但只要企业能不断调整结构,努力保持对外部环境的适应性,维持正常的风险免疫功能,理论上是可以保持“基业长青”。因此,内部控制风险免疫系统如何有效地识别与应对组织异己问题,是内部控制理论迫切需要研究的重要问题。

通过研究企业异己的内涵、特征、演化过程及企业异己扫描,剖析异己之间的内在关系,探索异己的演化机制,为接下来研究和理解内部控制风险免疫系统的作用机制及其衍生出来的价值效应提供有益的逻辑起点。

(二) 内部控制风险免疫机制的初步建构

在当前知识和信息膨胀、个性化需求日益凸显的竞争环境中,企业目标早已超越了传统企业本体价值最大化或股东财富最大化的目标诉求,更多的是实现利益相关者等关键要素投入主体对价值创造、价值增值、价值分配的持续关注。但价值增值目标的实现并非易事。从社会的商业生态系统角度来看,单个企业显然没有满足所有利益相关者多样化需求的能力,因此,更多的企业开始摒弃过去“竞争性经济”下以争夺现有资源为主要特征的零和博弈,转而依靠“协同性经济”下以知识分享与价值并用、合作解决问题的正和博弈。在企业整体经济体系中,如何开展正和博弈,关键在于建立一个健全有效的风险免疫环境,而内部控制对维护和优化风险免疫环境具有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可以从两个角度分析:第一,从内部控制的发展演化脉络来看,尽管内部控制的发展经历了内部牵制、内部控制制度、内部控制结构、内部控制整体框架、企业风险管理整合等五个阶段,其概念(包括内容和范围、要素与环节等)发生了多次变化,但是风险管控与价值增值追求的本质目标依然没有发生改变;第二,从企业契约集合体视角来看,企业内部控制的建构和发展源于企业利益相关者对提升契约效率和降低交易成本的追求,企业实施内部控制的动力不仅源于自身对经营秩序和效率的追求与应对政府的监管需求,而且源于利益相关者(企业契约的缔结者)出于对信任的追求以及交易秩序的维护。作为企业的风险免疫系统,内部控制通过识别、防御、监控与自稳、记忆等免疫功能,降低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风险预期,确保其投入的资产得到有效使用并获得预期投资报酬,从而存续和扩展企业与利益相关者间的合作与交易关系。因此,作为企业的风险免疫系统,内部控制不仅能给企业本身带来提升公司治理水平、改进会计信息质量、保障经营合规合法性、提高经营绩效的基本效应,而且能更好地满足利益相关者的制度信任与价值增值的利益诉求,我们将这些效应定义为内部控制的溢出效应。基于此,我们根据生态学的基本理论,借鉴生物学研究领域中生物有机体免疫系统应答机理的思想,从免疫应答的三个阶段出发,探索企业内部控制风险免疫系统的作用机制。在生态学视角下,将内部控制风险免疫系统中的识别、防御、监控与自稳、记忆等免疫功能作为强化内部控制风险免疫功能效应的传导机理(如图2)。

1. 免疫识别是强化内部控制风险免疫功能效应的前提

全面识别和评估风险的性质、发生的可能性、发生的频率是强化内部控制风险免疫功能的前提。一方面,企业内部分工深化所导致的认知局限性问题日益加剧,合理识别和评估风险的知识短缺且日趋分散;另一方面,企业外部交易活动中存在的不确定性(利益相关者的不同偏好、信

息不对称、交易主体潜在的机会主义倾向等）影响了企业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合作，表现为利益相关者的交易选择、交易契约的达成与修改、契约实现的预期和契约方式的选择等方面。首先，企业保证在动态复杂环境中有效地识别和评估企业风险（即分析企业内外部的潜在风险给企业带来的危害还是创新机会）。只有内部控制具备风险免疫识别能力，才能够识别企业内外部具有负面或正面影响的潜在事项。其次，内部控制风险免疫系统在动态复杂环境中将风险监控重心前移，重点识别和评估概率较小但具有灾害性的潜在影响事件以及企业风险的高发区域，以期在风险发生初期就能敏锐地识别。最后，将所有内容集合在一起，通过内部传递和交流达成共识，或通过外部披露，化解或者减低利益相关者个体偏好与企业整体利益间的矛盾，从而最大限度地达成控制目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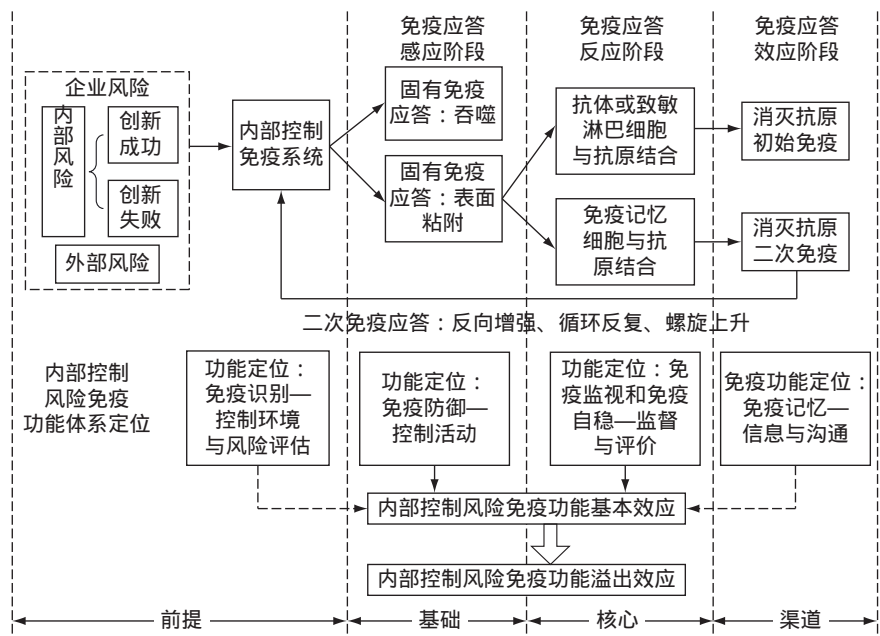


图2 生态学视角下内部控制风险免疫系统的逻辑重构

2. 免疫防御是强化内部控制风险免疫功能效应的基础

机体的免疫防御是指机体排斥外源性抗原异物的能力（包括抗感染、排斥异种或同种异体的细胞和器官），这是机体不受外来物质干扰和保持物种纯洁的生理“自净”机制。内部控制与其基本类似，能够在事前有效地识别和防御企业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和内部不稳定因素，采取措施降低风险事故的发生概率，因此免疫防御成为强化内部控制风险免疫功能的基础。从契约自我履行（区别于法庭的强制履行）的角度来看，内部控制具有风险防范的本源特征和属性。内部控制一旦建立并有效履行，一方面能够自动抵御威胁、危害、风险，进而降低利益相关者的风险预期。另一方面，内部控制作为企业不可收回的沉落成本，成为与利益相关者进行持续交易的可置信承诺或者潜在的抵押品。这样，企业各利益集团（职能部门）就形成以内部控制为核心的自我实施的单边协议，形成不断进行交易的自我约束激励制度。首先，免疫防御如何能够事先降低企业风险的发生概率，即企业如何快速建立或调整资源配置以形成新的网络和对策，如何有效防御那些可能产生致命打击甚至导致企业灭亡的风险，以确保不出现任何偏离企业内部控制目标的重大行为、过程和结果；其次，内部控制作为企业风险免疫系统，在专业化分工与协作的背景下，是选择怎样的标准化流程和作业方式来防御和控制风险，最终将风险降低到合理的水平，使之与利益相关者的风险预期相匹配，从而促使企业内部责任单位之间、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之间进行持续性

交易,满足各自的利益诉求。

3. 免疫监视和免疫自稳是强化内部控制风险免疫功能效应的核心

免疫监视是指机体清除和杀灭异常或者突变细胞并抑制恶性肿瘤在体内生长的能力,免疫自稳是指机体识别和清除自身衰老残损的组织与细胞的能力,这两种能力是维持机体与环境稳定共生的重要能力。一旦免疫监视和免疫自稳无法发挥作用,机体就会出现紊乱,容易患上恶性肿瘤。内部控制是通过免疫识别发现组织内外部影响企业正常运作的风险和危机,并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处理,以便消除风险隐患或者将风险降低到可接受的水平,维持组织内部的活力、协调和均衡。因此,免疫监视和免疫自稳是强化内部控制风险免疫功能的核心。就企业而言,由于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和经济人的有限理性,并且由于某些影响专业化结果的因素(如联合产出中的努力程度、关系专用性投资水平等)不能被法庭等第三方所证实,企业内部代理人与利益相关者之间无法缔结完备的合约,最终交易结果取决于他们在交易过程中的相互信任关系和相互制约能力。因此,他们会从个人自利和结果偏好的角度出发围绕报酬分配而争论不休。如此,企业内部可能会发生内耗甚至混乱,也可能导致企业内部代理人缺乏工作热情,损害利益相关者的投资积极性,从而侵蚀企业赖以存在的基础。从内部控制风险免疫系统的治理功能来看,作为一种持续均衡利益关系的契约装置,内部控制通过规定交易主体在交易关系中的权利与义务,确定交易主体在交易关系中的行为边界、惩罚或补偿标准,进而在短期和长期内通过实现“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持续均衡,在利益相关者之间形成一种动态制约机制,实现监视和自稳功能,解决冲突和矛盾,增进分工协作效益,调整利益分配,保持企业活力。首先,免疫监视和免疫自稳如何能够高效地清除影响企业正常运作的不稳定因素,即企业内部控制如何掌握免疫监视和免疫自稳的反应程度。免疫监视和免疫自稳反应不足或反应过度,都会形成异常反应,导致企业整体功能失衡,企业面临的危机情况恶化。其次,内部控制风险免疫系统是通过何种作用路径来确保免疫监视和免疫自稳不出现错误反应,具体而言:一是如何保证不对有益因素产生异常反应(如排斥创新、浪费发展机遇、外部资源无效利用等),即内部控制如何在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对各种风险因素进行监视和自稳,将风险在不同风险偏好的利益相关者之间进行合理分配或有效转移,以使利益相关者对未来经济活动形成稳定的预期,诱导新的利益相关者加入,保证交易伙伴的诚意;二是如何保证对有害因素的准确判断,并且能够及时解除企业面临的风险,即内部控制是如何监督关键利益相关者,确保非关键利益相关者的正当利益不被关键利益相关者攫取,最大限度地维护交易公正和公平,协调和均衡企业内部利益分配,避免出现混乱和内耗,最终避免企业蒙受损失。

4. 免疫记忆是强化内部控制风险免疫功能效应的渠道

免疫记忆是指当病原体首次侵入机体时,免疫系统通过学习产生的抗体可以消灭该病原体;如果该类型病原体再次入侵,免疫系统固有的记忆细胞能够唤醒免疫系统,并迅速产生大量的抗体消灭该病原体。就企业内部控制而言,当企业面临危机和风险时,内部控制通过免疫识别与免疫评估,找到解决方法并采取免疫防御措施;危险解除后,内部控制通过总结经验,找出导致危险发生的内在机理,调整组织结构并加强学习和持续改进,形成免疫记忆,并将免疫记忆保存在风险应对过程中形成的知识、信息、措施、流程资料库之中,对企业认知和应对新的风险提供有益的借鉴和指导,因此,免疫记忆是强化内部控制风险免疫功能的渠道。尽管企业内各部门(职能部门)能独立开展风险应对活动并通过不同渠道传递信息,但由于企业内部分工细化和深化的原因,现有知识(包括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无法适应需求,常规化的知识协调和信息交流渠道无法满足知识局部化和分散化的环境要求,因此需要建立一个知识整合的共同体,将风险管控所需的知识与所有个体集合在一起,实现知识共享,并定期或不定期进行交流,识别、评估、处理

风险，将应对方案具体实施步骤、应对效果等进行总结并记录在案，实现知识储备与风险管控的良性互动。同时，企业还可以通过正式和非正式的信息传递渠道，将这些总结和记录向企业内部各部门、利益相关者进行传播，使相关信息能够及时传递并为各个层面所了解和掌握。内部控制风险免疫系统既是风险知识共享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实现企业风险信息传递的重要载体。首先，生物体内通过自我学习产生的记忆细胞可以在体内存活较长时间，但如果在较长时间内没有相同抗原再次侵入，记忆细胞也可能会慢慢衰退甚至消失。企业的免疫记忆对风险的作用机理是否与生物体相同？如果不同，那企业风险的作用机理优势在哪里？又是通过何种作用路径进行反馈以提高企业整体风险免疫效能的？其次，作为企业风险信息传递的重要载体，内部控制风险免疫系统是如何通过免疫记忆来激励和约束企业内部代理人和利益相关者行使权利的？如何在交易主体之间传播、分享、储存由生产经营、风险管理等所积累的知识与经验，并引导不同的交易主体合理选择解决特定问题的方法？最后，作为应对企业风险的知识共享机制，内部控制风险免疫系统是如何通过免疫记忆功能，将每次风险应对的最优结果嵌入企业的组织结构、战略、惯例、文化之中，形成组织记忆并对企业的运作和发展起作用，最终使利益相关者建立对企业的高度信任和稳定预期，提高交易的可靠性和可预见性，保证投资价值创造活动的正常运作和发展。

五、研究展望：一个简要结论

本文引入“免疫系统论”学科基础和内在逻辑，探索、追踪、检验内部控制对企业风险的防控机理，揭示内部控制与企业风险的关系；引入制度环境的差异特征和内外部治理机制的互动关系，考察内部控制“免疫系统”功能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进一步分析和检验哪些重要的公司治理机制构成了内部控制缺陷及其修复过程的传导机制；从企业利益相关者风险感知及其所反映的资源配置效率角度出发，考察内部控制系统再造和质量改进，强化内部控制风险免疫功能。具体来说，本文结合中国企业的内部控制实践，以生态学这一独特的视角作为强化内部控制风险免疫能力的基点，引入“免疫系统论”学科基础和内在逻辑（免疫系统包括免疫识别、免疫防御、免疫监视、免疫自稳、免疫记忆，且免疫系统是一个动态调节的系统），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内部控制免疫系统功能的分析框架；以上述分析框架为理论基础，揭示内部控制与企业风险的关系，全面探索、追踪、检验内部控制对企业风险（主要包括合规风险、信息风险、财务风险、经营风险、战略风险等）的影响路径，进一步分析和检验宏观环境因素、外部治理机制、微观企业特征在上述具体影响路径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作用机理；跟踪、分析和检验公司治理机制在内部控制缺陷及其修复过程中的动态作用路径，检验这个动态过程给企业本体带来的基本价值，并从审计师、债权人、供应商、客户、外部投资者等利益相关者视角，挖掘和检验内部控制“免疫系统”功能如何反映企业利益相关者对企业风险的感知及其映射出来的资源配置效率，以期为学术界理解内部控制影响企业风险的动态作用机理提供新的思想，也为内部控制“免疫系统”整体功能再造和价值效应体系研究积累新的科学知识。

参考文献：

- [1] JENSEN M C, MECKLING W H. Theory of the firm: managerial behavior, 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 [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976, 3 (4): 305-360.
- [2] 夏恩·桑德. 会计与控制理论 [M]. 方红星, 译. 大连: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0: 前言.
- [3] DOYLE J T, GE W L, MCVAY S. Accruals quality and internal control over financial reporting [J]. The accounting review, 2007, 82 (5): 1141-1170.

- [4] 张国清. 内部控制与盈余质量——基于2007年A股公司的经验证据[J]. 经济管理, 2008, 30(23): 112-119.
- [5] ALI FEKRAT M, INCLAN C, PETRONI D.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disclosures: competitive disclosure hypothesis using 1991 annual report data [J].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ccounting, 1996, 31(2): 175-195.
- [6] 方红星, 金玉娜. 高质量内部控制能抑制盈余管理吗? ——基于自愿性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的经验研究[J]. 会计研究, 2011(8): 53-60.
- [7] BROWN N C, POTT C, WÖMPENER A. The effect of internal control and risk management regulation on earnings quality: evidence from germany [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public policy, 2014, 33(1): 1-31.
- [8] 赵息, 张西栓. 内部控制、高管权力与并购绩效: 来自中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J]. 南开管理评论, 2013, 16(2): 75-81.
- [9] 杨雄胜. 内部控制范畴定义探索[J]. 会计研究, 2011(8): 46-52.
- [10] 李心合. 内部控制研究的困惑与思考[J]. 会计研究, 2013(6): 54-61.
- [11] 杨兴龙, 孙芳城, 陈丽蓉. 内部控制与免疫系统——基于功能分析法的思考[J]. 会计研究, 2013(3): 65-71.
- [12] 贺伊琦. 基于自组织理论和仿生学的企业内部控制——内部控制学的新分析框架[J]. 上海立信会计学院学报, 2011, 25(6): 56-63.
- [13] MAIJOOR S. The internal control explosion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uditing, 2000, 4(1): 101-109.
- [14] WILLIS D M, LIGHTLE S S. Management reports on internal controls [J]. Journal of accountancy, 2000, 190(4): 57-62.
- [15] ASHBAUGH-SKAIFE H, COLLINS D W, KINNEY W R, et al. The effect of SOX internal control deficiencies and their remediation on accrual quality [J]. The accounting review, 2008, 83(1): 217-250.
- [16] HERMANSON H M. An analysis of the demand for reporting on internal control [J]. Accounting horizons, 2000, 14(3): 325-341.
- [17] NEWSON M, DEEGAN C. Global expectations and their association with corporate social disclosure practices in Australia, Singapore, and South Korea [J].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ccounting, 2002, 37(2): 183-213.
- [18] 李育红. 公司治理结构与内部控制有效性: 基于中国沪市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J]. 财经科学, 2011(2): 69-75.
- [19] 张会丽, 吴有红. 内部控制、现金持有及经济后果[J]. 会计研究, 2014(3): 71-78.
- [20] 陈汉文, 周中胜. 内部控制质量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J]. 南开管理评论, 2014(3): 103-111.
- [21] PALMROSE Z V, RICHARDSON V J, SCHOLZ S. Determinants of market reactions to restatement announcements [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2004, 37(1): 59-89.
- [22] 史蒂文·J. 鲁特. 超越 COSO——强化公司治理的内部控制[M]. 刘霄仑,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04: 12-16.
- [23] HAMMERSLEY J S, MYERS L A, SHAKESPEARE C. Market reactions to the disclosure of internal control weaknesses and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ose weaknesses under section 302 of the Sarbanes Oxley Act of 2002 [J]. 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 2008, 13(1): 141-165.
- [24] 杨德明, 冯晓. 银行贷款、债务期限与上市公司内部控制[J].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2011, 33(8): 44-50.
- [25] 郑小荣. 内控监管能否增进股东利益——基于《通知》发布日和深市A股市场的事件研究法[J].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2011, 33(2): 100-108.
- [26] 杨清香, 俞麟, 宋丽. 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与市场反应研究: 来自中国沪市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南开管理评论, 2012, 15(1): 123-130.
- [27] CHAN K C, FARRELL B, LEE P. Earnings management of firms reporting material internal control weaknesses under section 404 of the sarbanes-oxley act [J]. A journal of practice & theory, 2008, 27(2): 161-179.
- [28] GAO F, WU J S, ZIMMERMAN J.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of granting small firms exemptions from securities regulation: evidence from the sarbanes-oxley act [J].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2009, 47(2): 459-506.
- [29] GE W L, MCVAY S. The disclosure of material weaknesses in internal control after the sarbanes-oxley act [J]. Accounting horizons, 2005, 19(3): 137-158.
- [30] 方春生, 王立彦, 林小驰, 等. SOX 法案、内控制度与财务信息可靠性——基于中国石化第一手数据的调查研究[J]. 审计研究, 2008(1): 45-52.
- [31] 张龙平, 王军只, 张军. 内部控制鉴证对会计盈余质量的影响研究: 基于沪市A股公司的经验证据[J]. 审计研究, 2010(2): 83-90.
- [32] 董望, 陈汉文. 内部控制、应计质量与盈余反应: 基于中国2009年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审计研究, 2011(4): 68-78.

- [33] 范经华, 张雅曼, 刘启亮. 内部控制、审计师行业专长、应计与真实盈余管理 [J]. 会计研究, 2013 (4): 81-88.
- [34] 刘行健, 刘昭. 内部控制对公允价值与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 [J]. 审计研究, 2014 (2): 59-66.
- [35] 肖柯. 制度分析的生态学范式初探 [J]. 学术探索, 2011 (4): 17-22.
- [36] COASER H.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J]. Th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984, 140: 229-231.
- [37] 青木昌彦, 比较制度分析 [M]. 周黎安, 译. 上海: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1: 5-11.
- [38] R. 科斯, A. 阿尔钦, D. 诺斯. 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 [M]. 刘守英, 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94: 3-53.
- [39] 姚洋. 制度与效率: 与诺思对话 [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2: 182-209.
- [40] 张五常. 中国的前途 [M]. 香港: 香港信报有限公司, 1988: 172-194.
- [41] VOSS U, BRETTEL M. The effectiveness of management control in small firms: perspectives from resource dependence theory [J]. Journal of small business management, 2014, 52 (3): 569-587.
- [42] TESSIER S, OTLEY D. A conceptual development of Simons' levers of control framework [J]. Management accounting research, 2012, 23 (3): 171-185.
- [43] 沈烈, 郭阳生. 管理者能力与内部控制质量: 抑制还是促进? [J].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17 (4): 58-67.
- [44] 吕成龙. 中美证券市场治理的关键变量比较与法律移植 [J]. 证券法律评论, 2015 (1): 293-302.
- [45] 余正荣. 生态智慧论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161-203.
- [46] 吴开超, 郭峰, 陈焱. 制度性边界与中国经济的制度性扩张 [J]. 财经科学, 2002 (2): 101-105.
- [47] LEIFER R, MILLS P K. An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pproach for deciding upon control strategies and reducing control loss in emerging organizations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1996, 22 (1): 113-137.
- [48] GREEN S G, WELSH M A. Cybernetics and dependence: reframing the control concept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88, 13 (2): 287-301.
- [49] 汤姆·R. 伯恩斯. 结构主义的视野: 经济与社会的变迁 [M]. 周长城,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167-201.
- [50] BURNET F M. The clonal selection theory of acquired immunity [M]. Nashville: Vanderbilt University Press, 1959: 125.
- [51] MATZINGER P. Tolerance, danger, and the extended family [J]. Annual review of immunology, 1994 (12): 991-1045.

The Logic Mechanism of the Risk Immunization of Internal Control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y

Lin Zhonggao

Abstract: Based on the reflection on realistic problems and the literature review of internal control, referring to the basic principle of ecology, internal control is defined as a risk-immune system with ec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immune recognition, defense, monitoring and self-stabilization and memory functions. The logic mechanism of the risk immunization of internal control system is thoroughly analyz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theories and the reconstruction framework of enterprises' internal control system is proposed to promote the risk immunization quality of internal control.

Keywords: internal control; ecological theories; risk immunization system; logic mechanism

(收稿日期: 2019-11-05; 责任编辑: 沈秀)